

台灣史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前後 ——日記如是說「終戰」

許雪姬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所長

中文摘要

本文使用林獻堂、黃旺成、黃繼圖、吳鴻麒、吳平城、楊基振、吳新榮個人的日記（三人在海外、五人在台灣），分成八月十五日當天，以及其前、後做為探討八月這個月，面對日本的投降，台灣人如何反應。過去官方的記載總是說，對於戰後重回祖國懷抱，台灣人滿心歡喜，實則經由這八位記主的日記可以了解，台灣人的感情相當複雜，既不能無視於日本的敗，也還難以正視中國的勝，但至少也有戰爭結束的歡喜，及對未來的不安。

日記是個人連續性的生活記錄，是研究歷史的第一級史料，由日記可以看出個人不同的心情，但同時也可以由不同人的日記建構出一個共同的終戰之歷史記憶。

關鍵字：日記、日本投降、終戰、林獻堂、黃旺成、黃繼圖、吳鴻麒、吳平城、楊基振、楊英風、吳新榮

End of WWII: Taiwan in the Days Before and After August 1945

Hsu Hsueh-Chi

Research Fellow & Director,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ituation of Taiwan in the days before and after August 15, 1945, on which the Second World War ended. By reviewing the personal diaries of Wu Pingcheng (吳平城), Yang Jizhen (楊基振), and Yang Yingfeng (楊英風), who lived overseas, as well as those of Lin Hsien T'ang (林獻堂), Ng Ong Seng (黃旺成) and Huang Jitu (黃繼圖), Wu Xinrong (吳新榮), Wu Hongqi (吳鴻麒), who lived in Taiwan,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response of Taiwanese in the days prior to and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urrender of Japan. Past official records often painted a picture of Taiwanese rejoicing over the end of Japanese colonization and the return of Taiwan to China. However, the diaries of Taiwanese, both local and abroad, seemed to reflect a more complex emotion over the defeat of Japan and the victory of China. The elation over the end of war was mixed with apprehension of the uncertain future.

While diaries detail the serial records of a person's life, they also serve as first-rate information sources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From the diaries of the above individuals, we can see their different feelings towards the surrender of Japan,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establish a collective memory concerning the end of WWII.

Key words: diary, surrender of Japan, end of war, Lin Hsien T'ang (林獻堂), Ng Ong Seng (黃旺成), Huang Jitu (黃繼圖), Wu Hongqi (吳鴻麒), Wu Pingcheng (吳平城), Yang Jizhen (楊基振), Wu Xinrong (吳新榮), Yang Yingfeng (楊英風)

台灣史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前後

——日記如是說「終戰」¹

一、前言

日記是個人逐日將自己一天的行事、感覺寫成文字保存而成的紀錄，是最重要的精神生活表徵，也是「時代的第一級資料」²。日記中能盡情傾訴自己的感覺，雖然透過文字也有不能完全表達當時情緒於萬一之憾，但對了解記主仍是最頂級的資料。寫日記的人都知道保存日記是種甜蜜的負擔，有時在緊急時必須燒掉，有時在天災中無法搶救，有時在記主³過世後，家人隨意棄置，與人俱亡，因此能保留下來的日記相當有限⁴。

由於台灣近百餘年來由三個不同的政權統治，統治者留下不少官公文書，成為研究歷史最重要的素材；然而上述資料只有統治者、殖民者的觀點，沒有被統治者、被殖民者的心聲，因此利用後者的日記來照觀當時的社會狀況，成為研究日治、戰後台灣史重要、不可或缺的資料。截至目前為止已有不少日記

¹ 1945年8月15日當天，身為殖民地的台灣人，難以明確感知究竟對台灣人而言這場戰爭是「戰敗」了還是「戰勝」了，但共同的感覺是戰爭終於結束了的喜悅。以吳平城的感覺為例，他在得知日本投降後記道：「我個人是掩不住滿心的歡喜，生命是真正的保全了，只要能早一天回台灣見家人，我什麼都不想，萬歲。」見吳平城著，《太平洋戰爭軍醫日記》（台北：自立報系，1989年），頁184。以下簡稱《軍醫日記》。

² 野坂昭如，《「終戰日記」を讀む》（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2005年），頁4。

³ 「記主」指的是寫日記者。筆者習用吉成勇編，《日本「日記」總覽》（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94年），不著頁數，凡例：「記主は、當該日記の筆者を指し」。

⁴ 如林紀堂夫人陳岑女士，亦有寫日記的習慣，被其子偷去二本，就將以往的日記燒掉。〈陳岑女士日記〉，1924年11月28日：「余出外書房拾歸余大正五年及七年日記，因被逆子（魁梧）偷去二本，係十年餘，盡皆付丙。」而後養成燒日記的習慣，1924年11月26日：「今早檢查（大正）11年日記，閱畢付炬」。目前只留下1924年的日記。

為研究日治、戰後台灣史重要、不可或缺的資料。截至目前為止已有不少日記出版，亦有一些未出版⁵，但積極註解、出版、利用則是近十年的事。截至目前為止，以日記資料為主國內曾召開過四次研討會，其中兩次分別集結出書，即《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日記與台灣史研究——紀念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

雖有上述成績，但日記的研究可說才剛開始，日記有別於事後追記的回憶錄、和經由訪談者協助完成的口述歷史，它是長期、連續的紀錄，較能直言無隱地寫出自己真正的想法，因此可以了解台灣史上較敏感時刻人們的行動、感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是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投降的一天，那一天台灣人都聽了「玉音放送」嗎？他們的感覺如何？而戰爭進入第四個年頭（若自一九三七年算起，則為第八個年頭），他們的生活有何改變，日本投降後，他們如何面對？過去官方總是說，台灣人對回歸祖國滿心歡喜，真相如何？在台灣，這是一個過去少有人利用日記史料談過的議題⁶，在日本野坂昭如⁷則曾在二〇〇五年七月出版《「終戰日記」を読む》一書，此為其在二〇〇二年八到九月在 NHK 人間講座的文本為底所寫成，書中包括十一個文學家、政治家日記中的八月十五日⁸。川島真、貴志俊彥也編纂《資料で読む世界の 8 月 15 日》，在第 II 部談到台灣、朝鮮、滿洲の光復／解放記念日⁹。筆者亦擬以八月十五日這天的日記為主，兼及八月這個月日記中所透露的戰爭前後的生活，舉凡個人的心情，感知週遭環境的變化，家族、朋友的互動，甚至閱讀、休閒生活、天氣、物價等。

本文選擇了八種日記，五種在台灣、三種在島外（二人在平津，一人在西貢）寫成。四種已出版，四種未出版，將就其八月十五日前對戰爭的感知、八

⁵ 已出版的不贅，未出版的有吳鴻麒、葉盛吉、何金生、楊肇嘉、林紀堂、林朝崧、楊水心、陳岑、高慈美、洪國式等人日記。

⁶ 曾健民稱此日為「破曉時刻的明與暗」，引用吳新榮的日記，做為第四節「台灣作家的八月十五日——歡喜中的不安」的素材。見曾健民，《1945 破曉時刻的台灣：八月十五日後激動的一百天》（台北：聯經，2005 年），頁 37-41。但一般著作仍未談到。

⁷ 1930 年出生於日本鎌倉，早稻田大學法文科肄業，1963 年發表處女作《エ工事師たち》，1969 年出版《アメリカひじき》、《火垂るの墓》，1968 年獲得直木賞，1999 年得吉川英治文學賞，2002 年得泉鏡花文學賞。2003 年中風，2005 年出版《「終戰日記」を読む》。

⁸ 本書中頁 216-219，有〈「日記」の書せ手たち〉介紹這 11 個人。

⁹ 川島真等，《資料で読む世界の 8 月 15 日》（東京：株式會社山川出版社，2008 年），頁 69-80。

月十五日當天的記載，八月十五日以後時局和生活的變化著眼。由於八個人的出身背景各異，可以探討的層面較廣，透過八月整個月的觀察，可以彌補目前研究台灣戰後史者，在八月十五日到十月二十四日這段期間過於簡化的不足。

二、選擇的日記與記主

本文選擇五種在島內寫的日記，記主分別是林獻堂、吳新榮、黃旺成、黃繼圖、吳鴻麒；在島外的三種，記主分別是楊基振、楊英風、吳平城。之所以選擇這八種日記，主要的理由為吳新榮、楊基振、楊英風日記都在這一兩年內出版，使用此為研究素材者還少，吳平城則在西貢度過八月十五日，雖早在一九八九年已出版《軍醫日記》一書，但有其稀有性。而林獻堂、黃旺成、黃繼圖、吳鴻麒日記雖未出版，但本人看得到前三者的原本及後者的影印本。

第二個理由是八個人中吳鴻麒在台北，黃旺成、黃繼圖父子在新竹，林獻堂在台中，吳新榮在台南，楊基振在唐山、楊英風在北京、吳平城在西貢，大半在不同的地區，可以觀察不同地區的特色。

第三個理由是這八種日記的記主的職業在社會上也具有代表性，林獻堂是台灣第一流的紳士，在戰爭中擔任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參與，他的言動具有代表性；黃繼圖、吳鴻麒兩人都出身法界，戰爭中雖疎開，仍間歇性執業；吳新榮、吳平城兩人都出身南部，前者是佳里的開業醫，吳平城則被征調赴西貢為軍醫，遭船難大難不死，而有機會見到在西貢的八月十五日；楊基振是唐山啟新水泥廠唐山工廠的副廠長，他在唐山的八月十五日是相當不尋常的；楊英風則在學畫中，先在北戴河寫生不成，返回北京後即面對八月十五日；黃旺成則賦閒在家，以他簡潔的文字留下他生命中非常特別的八月天。

為使讀者對這八部日記能很快地了解，依序簡介如下：

(一) 林獻堂(1881~1956)：林獻堂開始寫日記之時可能較早，現存者以一九二七年為最早，但並不完整，一直到一九三〇年才開始逐日寫日記，日記寫到一九五五年，前後二十九年，缺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六年，其中有些年分缺二到三個月¹⁰。

¹⁰ 許雪姬，〈《灌園先生日記》的史料價值〉，收入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

(二) 黃旺成 (1888~1979): 目前所存的日記自一九一二年起到一九七九年, 自一九一二年一月到一九一五年二月用日文寫, 此後全用中文夾雜台式、日式漢文。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日記全, 唯篇幅不多, 目前已出版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日記兩冊, 有中文譯文¹¹。

(三) 黃繼圖 (1912~1974): 為黃旺成長子, 京都帝大法律系畢業, 為辯護士。日記始於一九二九年, 止於一九七二年, 前後共三十九年¹², 其中自一九二九到一九七三年和黃旺成的日記重疊, 由父子日記中所記相關的事、不同角度的看法, 參照起來頗為有趣。八月整月的日記, 用日文記載。但戰後在每日日記空白處, 用中文寫下大事記, 目前尚無出版的計畫¹³。

(四) 吳新榮 (1907~1967): 一九三二年畢業於東京醫學專門學校, 旋在家鄉佳里行醫。其日記在進入台南商業專門學校一、二年後開始記, 赴日求學期間亦然, 先後持續五、六年之久。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日本政府大舉逮捕日本共產黨, 史稱「四一六事件」, 被拘留二十九天, 日記全被沒收, 遂中輟, 直到一九三三年才開始寫¹⁴, 一直到一九六七年。二〇〇七年在張良澤總編撰下出版第一、第二冊¹⁵, 二〇〇八年全部十一冊出版完畢¹⁶。日記早期用日文寫作, 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起, 即日本投降第二天即用中文記載, 和楊基振、楊英風同。

(五) 吳鴻麒 (1899~1947): 幼習漢學八年, 一九一三年公學校畢業即取得書房教員資格, 一九一八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畢業後任教六年, 而後就讀上海協和中學高等科與上海國語師範學院, 之後入日本大

(一) 一九二七年》(台北: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2000年), 頁(1)、(5)。

¹¹ 黃旺成著, 許雪姬主編, 《黃旺成先生日記》(一)、(二)(台北: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國立中正大學, 2008年)。中間缺1918、1920、1932、1938、1940、1944、1947-1948、1952、1954、1965、1967、1969。

¹² 黃繼圖的日記中有1937、1947、1952-54、1973-74年缺。父子兩人都缺1947年的日記令人遺憾。

¹³ 此部日記和黃旺成先生日記, 是經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曾士榮教授介紹認識陳逢中教授, 由他介紹, 認識其堂兄黃光宇先生, 承其好意, 將這兩部日記的出版交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來處理。謹向曾士榮、陳逢中、黃光宇先生致謝。

¹⁴ 鄭喜夫, 《吳新榮先生年譜初稿》(台中: 編者自印, 1977), 收入台灣人物年譜叢刊第四種, 頁13。

¹⁵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 《吳新榮日記全集》(一)、(二)(台南: 台南國家文學館, 2007)。

¹⁶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 《吳新榮日記全集》(三)~(十一)(台南: 台南國家文學館, 2008)。

學專門部法科，一九二八年畢業，一九三〇年取得律師資格。其現存日記乃寫在二十八細行筆記本中，由於漢文有造詣，因此日記全用漢文，仍不免夾雜日式漢文。目前所存的日記為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即他在三月十二日被逮捕的前一天為止¹⁷。八月的日記不全，無八月六日到八月十七日，然其在一九四六年元旦回憶八月十五日當天，及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他回憶去年此日的情形可補其不足。

（六）楊基振（1911~1990）：一九三一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畢業後於一九三四年考上滿鐵（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一九三六年任一等車站大石橋站（大連與奉天之間）副站長，後調至華北交通株式會社天津鐵路局，一九四五年辭職，轉入唐山啟新水泥廠公司唐山工廠。八月十五日人在天津。他的日記自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九〇年，二〇〇七年出版三冊（只出到一九五〇年）¹⁸，其餘原稿藏於國史館。日記用日文記載，八月十六日改用中文書寫，八月日記完整。

（七）楊英風（1926~1997）：十五歲到北京依親，轉入日本中學校就讀，一九四三年考取東京美術學校建築系，惜因戰火未克完成學業即回北京協助家業。一九四六年考取北平輔仁大學美術系，一九四八年轉學台灣省立師範學校藝術系，一九五一年擔任《豐年》雜誌美編，期間大量創作鄉土版畫及漫畫，刻畫台灣早期農村生活的風土人情。一九七〇年與貝聿銘合力製作日本大版萬國博覽會中華民國館前景觀之「鳳凰來儀」而聲譽鵲起。一九九三年獲頒行政院文化獎，為台灣現代雕塑藝術家之翹楚¹⁹。其日記自一九四〇年十五歲時寫起，到一九四八年止，是為早年日記，一向用日文、摻雜畫作寫作，八月十六日起用中文寫作。目前已出版為《楊英風全集》第二十一集²⁰。八月全月日記完整。

¹⁷ 此為吳鴻麒妻楊焄治影印交由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收存，筆者有幸取得其再影印本。本日記在1947年3月13日由其妻續道：「午後三時頃、法院ヨリ二名私服者二連行、行方不明、方々探シタルモ術ナク。五日目ノ夕刻、南港石橋ノ袂デ屍を發見シタ、死亡ハ十六日（舊二月二十四日）子時と聞く。」

¹⁸ 楊基振著，黃英哲主編，《楊基振日記附書簡・詩文》上、中、下冊（台北：國史館，2007年）。

¹⁹ 許雪姬總策畫，《台灣歷史辭典》（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遠流出版公司，2005年），頁969。

²⁰ 蕭瓊瑞主編，〈早年日記〉，《楊英風全集》第21集（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8年）。

(八) 吳平城 (1914~?): 台南人, 一九三八年日本岩手醫專畢業, 回台後服務於台南西港組合病院, 翌年回故鄉安南區海尾開業。一九四四年被台灣總督府調為日本高等官囑託軍醫, 派往南洋, 十二月一日搭「神靖丸」出發, 在西貢外海聖雀岬被美機炸沈, 全船三百四十二人, 只有九十二人生還。一九四五年改航新加坡, 又因新加坡遭遇大空襲而未果, 四月八日到西貢赴任, 直到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回台。因此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他在西貢。這本日記價值相當高, 但因有事後添加與補記的情形, 使用時不可不查。八月的日記, 分成八月上旬、中旬、下旬各一篇, 幸好八月中旬中有八月十五日這天自中午到晚飯後的描述²¹。

三、八月十五日前的生活

一九四五年中日戰爭已進入第八年 (或第十五年), 太平洋戰爭也已進行三年多, 眼看日本已有敗象, 當時台灣人在戰事最後的十五天, 如何過生活:

(一) 頻遇空襲, 與防空壕為伍: 在黃旺成所住的新竹, 八月八日中午十二時十五分有 B24 的美機二十餘架, 分成四隊襲擊新竹飛機場, 投下散光彈及錫箔, 高砲聲、投彈聲使地為之震動; 八月十日 B24 飛機二十二架再在燃料廠一帶投彈, 八月十二日他自新埔返家至燃料廠時又有空襲警報, 八月十五日他要到新埔時, 還看見空中曳白線, 眾人叫說是 P38 機, 但沒有空襲警報²²。八日, 黃繼圖的日記也記下了「飛行機來襲」與其父日記共做印證。在南部的吳新榮, 八月十一日記載當天敵機數次在空中盤旋、通過, 到中午有空襲警報聲, 八月十二日, B24 有二十四架分四個編隊通過上空, 但都沒有投彈²³。中部林獻堂為了應付頻繁的空襲, 在其大埕新建防空壕, 並修繕中庭的防空壕, 以備用²⁴。

和空襲息息相關的對應設施是防空壕, 這是保命的安全防禦設置, 每家都有相關的設備。七月底八月初, 台灣全島下了大雨, 吳新榮稱之為「六年

²¹ 《軍醫日記》, 頁 184-185。

²² 〈黃旺成先生日記〉, 1945 年 8 月 8 日、10 日、12 日、15 日。

²³ 吳新榮, 《吳新榮日記全集》第 8 冊, 1945 年 8 月 11 日、12 日, 頁 169-170。

²⁴ 〈灌園先生日記〉, 1945 年 7 月 30 日。

來的第一次大水災」²⁵，對防空壕造成一定的破壞，在新竹黃旺成家的防空壕進了水，他必須在八日、十一日汲壕水，以備萬一，即使八月十五日不再有空襲，他仍必須汲水²⁶。再看吳新榮家的防空壕，也因這次大雨將他「最高級的、最終的、充滿自信的防空壕沖得完全崩塌了」²⁷，以致於和黃旺成一樣，他必須盡快汲出防空壕的積水。在汲出水比地面低一尺時，就入壕看裡面的狀況，幸好壕壁沒有崩毀，因此取出裡面的物品²⁸。由於原有的防空壕進水，乃重新蓋「地上壕」，以備不時之需²⁹，到十一日即已修好。又因八月十二日還有敵機飛過之事，乃加緊整備，「裡面供奉千手觀音、香果，再搬進家財，並在壕上的草皮灑水。……正如《巖窟王》（《基度山恩仇記》）之住居。……把塌塌米擺進去的話，就是很舒適的床舖了。」雖然吳新榮認為地上壕的建設「已近完美」且佳里街的防災防空空地也快完成³⁰，但防空壕已因日本即將投降而沒用了。

（二）戰爭中的神明崇拜及心情：大凡人臨災難時，敬神之念最誠，但八位記主中，卻只有吳新榮和黃旺成日記中記載敬神之事，其實由日記中也可知吳新榮是這些記主中最敬神的。前已說及他在防空壕中供奉千手觀音³¹，八月十四日有「早上起床後，向神佛奉香」的紀錄，日本投降第二天，他在梳洗後「即獻香祖靈、神佛」³²。黃旺成在八月十四日（農曆七月七日，七夕），他們家還依例拜拜，日記載：「今日舊歷〔曆〕七夕，依例拜雙星，併舉行普渡，筆自昨日即做槿仔粿，蔬菜外別無佳肴。」³³

（三）缺乏物資、物價波動為戰時的共同現象：吳鴻麒律師在本年三月末即疏開至五股，以山園生活為主³⁴，八月一日他除草，下午及往後兩天都為了要開的義勇隊幹部會議，而終日掘地豆（花生），翌日義勇隊員都感謝他帶來的

²⁵ 《吳新榮日記》第8冊，1945年8月5日，頁167。

²⁶ 〈黃旺成先生日記〉，1945年8月20日：「清汲防空壕」、8月23日：「晚仍以壕水灌圃」。

²⁷ 同註25，1945年8月1日，頁165。

²⁸ 《吳新榮日記》第8冊，1945年8月5日，頁167-168。

²⁹ 同註25，1945年8月6日，頁168。

³⁰ 同註25，1945年8月14日，頁171。

³¹ 同註25，1945年8月12日，頁170。

³² 同註25，1945年8月16日，頁172。

³³ 「筆」即黃旺成長媳阮木筆（黃繼圖妻）。此一祭神之事，並未在〈黃繼圖先生日記〉中出現。

³⁴ 〈吳鴻麒先生日記〉，1946年1月1日。

地豆，可見物資缺乏的一斑³⁵。黃旺成家連七夕拜拜亦無佳餚，只有蔬菜，已如前述，六日的日記還特別記載「前晚亡失蕃鴨母一羽」。在平時，這是一件至極平常的事，原不值得一提，但在戰時，則又另當別論。如果看〈黃繼圖先生日記〉就知道家禽是戰時中非常重要的物資，掉了一隻蕃鴨母是一件嚴重的事。黃繼圖的日記五日記載正在產卵中的蕃鴨母不見了，將他必要的蛋白資源奪走了；隔天的日記，再記蕃鴨母真的不見了，被盜去無疑。似不勝遺憾！

做為鄉下醫生的吳新榮食物應該不缺，八月二日中午他由附近的酒樓西美樓叫了三道菜請客，但卻因晚上下雨，難以張羅，「除了白飯之外，什麼都沒有了」，物資亦難免一時之缺。

遠在北京，二十歲的青年藝術家楊英風，八月初正在避暑勝地北戴河寫生，他一一記下此行的花費，並感歎當地原該有海味珍品，這次卻是有錢也吃不到了³⁶。由北戴河回北京後，他感受到北京物價快速上漲，和上海幾乎沒有不同。而黃金的價格也呈現不穩定的狀態，黃金一兩原來價格二十多萬，卻在八月九日蘇聯對日宣戰後漲到四十八萬，但到十一日卻又急速下滑到二十五萬，他猜測因街上已謠傳著日本向聯合國無條件投降之故。

在唐山的楊基振，雖然衣食無缺，但也感受到蘇聯對日宣戰後，金價、銀價暴跌、股票暴漲的情況，他後悔未將手中的金子、銀子換成啟新的股票，以致剛搬到唐山來就遭到莫大的損失，而與妻悲歎時運之不濟³⁷。

（四）戰爭中罹病，可謂雪上加霜：八月初全台有大雨，這種陰濕的天氣最容易生病，再加上物資缺乏，營養不良，抵抗力減弱，更加重了病痛。林獻堂自七月三十日因「忙碌而足爪破處頗痛」，隔天化為「足目腫痛」，據疏開在林家的熱帶醫學研究所所員窪田一夫認為足目腫痛是「熱帶皮膚潰瘍之疾，未易即愈」³⁸，令林獻堂十分擔憂。他不只有足疾，還患了瘧疾³⁹，不止他患，其弟階堂、助役林士英亦得⁴⁰。吳新榮所在的台南，也有不少人得瘧疾，他用「真

³⁵ 〈吳鴻麒先生日記〉，1945年8月1、2、4-5日。

³⁶ 〈北戴河海濱避暑地〉，《楊英風全集第21卷：早年日記》，1945年8月9-10日，頁333。

³⁷ 《楊基振日記附書簡·詩文》上冊，1945年8月11日，頁178。

³⁸ 〈灌園先生日記〉，1945年8月9日。

³⁹ 同上註，1945年8月3日。

⁴⁰ 同註38，1945年8月7日、9日。

是可歎」、「蔓延猖獗」來描述⁴¹。吳鴻麒則因在山園的勞動疲累，「腹部生腫物一個，夜間相當激痛」⁴²。

（五）戰爭消息的傳佈：包括八月六日、九日原子彈炸廣島、長崎，俄對日宣戰、日本投降。

1、原子彈的消息：遠在西貢的吳平城醫生，在八日吃中飯時，才被同僚岡田告知 B29 帶一個像火柴盒大小的炸彈（原子彈），在廣島上空投彈，又聽說長崎也被炸，而美國只製了三顆同型炸彈，一顆實驗用，兩顆則用來轟炸日本⁴³。黃繼圖在六日的日記說：「廣島市街地區二新型爆彈」、十日：「長崎市二新型爆彈」（應為 9 日）。林獻堂在日記中補記（由原稿墨水濃淡判別）「原子爆彈廣島」、「原子爆彈長崎」。兩處的大轟炸，當時並未廣為所知，亦不知有所謂「原子彈」之名。

2、蘇聯對日宣戰：日、蘇間在一九四一年訂有日蘇中立條約，一九四五年二月蘇、英、美三國雅爾達會議後，蘇聯於四月對日本宣佈不再續約，而依與美、英的雅爾達密約，在八月八日對日宣戰（日本在八月九日由蘇聯的廣播中得知），旋即進攻「滿洲國」，成為壓垮日本的致命傷。在唐山的楊基振在八月八日記下：「今天蘇聯對日本宣戰」。在北京的楊英風在八月十日記下：「八月九日零時起，蘇聯對日本發動戰爭……。果然，蘇聯終於也宣告加入戰局。……我想戰爭結束的日期不遠了。」沒有在日記記下美國投下原子彈的黃旺成，在八月九日的日記寫「午後五時半大本營發表蘇聯軍今朝零時十分侵入國境與日、滿軍交戰中。」黃繼圖則在同日載：「ソ聯戰事宣言」。這一天林獻堂在日記中有比前述諸人更詳細的記載，雖然這一情報是來自吳天賞的告知：「蘇聯今日零時在滿洲國境砲擊日本軍。在開戰之數時間前，蘇聯外務人民委員長始對佐藤大使提出宣戰之通告。」他感歎「此後滿洲國之解決不知如何也。」次日當地巡查國枝，問他蘇聯對日宣戰的影響，他不明確表達，只說蘇聯要取勝不容易，反倒憂心日本內地遭受空襲，千餘萬的難民如何處置⁴⁴，可謂善於肆應。

⁴¹ 《吳新榮日記全集》第 8 冊，1945 年 8 月 5 日，頁 168。

⁴² 〈吳鴻麒先生日記〉，1945 年 8 月 5 日。

⁴³ 〈八月上旬〉，《軍醫日記》，頁 183-184。上述聽聞，不盡正確。又，當時並不知這兩顆就是原子彈。吳醫生的日記這部分做了事後追記，因此很準確地用稍後的通稱「原子彈」。

⁴⁴ 〈灌園先生日記〉，1945 年 8 月 10 日，林獻堂的回答是：「日滿鮮國境百數十萬大軍在焉，

3、日本投降：和蘇聯對日宣戰一樣，在北京附近的台人，要比在台的台人消息來得快，因為該地能收聽到來自重慶、夏威夷的廣播。楊基振在十一日已聽到重慶廣播說昨日（10日）日本以維持天皇制為唯一條件無條件投降，但他無法判明真偽⁴⁵。因此再收聽夏威夷的廣播，懷疑日本投降這新聞帶有很大的宣傳性質。十三日他再度收聽夏威夷廣播，「但越來越讓人覺得宣傳色彩過重，忍不住迷惘起來」⁴⁶。八月十四日他對日本投降一事仍是半信半疑，直到隔天才經證實，這時他正好到天津，進入吳三連開設的合豐行。

楊英風在八月十四日已得知日本天皇在翌日要親自發表詔書廣播，當天北京街上早知道日本已向盟軍投降的消息，但當天晚上收音機的消息卻「極為普通」。直到翌日才由收音機的廣播中得到證實。在西貢的吳平城要到十五日中午才由「玉音放送」中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

林獻堂早在德國無條件投降後，對日本未來的命運早已了然於心，只是未知其遲速罷了。他早在七月二十九日日記抄下《台灣新報》上有關盟國勸降日本的條件，但正式知道日本投降是在八月十五日。吳新榮在八月十五日以前對日本投降之事一無所悉。

黃旺成在十五日才知日本投降，但他在十四日日記已記上「阿南（惟幾）陸相自刃官邸（十四夜）」（可能是後來補記），而黃繼圖則在八月十四日已載：「日本受諾ポツダム宣言」。

（六）日人殖民下最後的十四天：這短短的十四天中，吳新榮、林獻堂兩人因職責所在，與日本官方尚保存一定的關係。吳新榮還在為高柳氏撰寫北門郡六十五人的人物簡介，作為日人全換街庄長的參考；也參加了在佳里公會堂舉辦的出征軍人家屬慰安演劇會⁴⁷。林獻堂在這段時間被通知安藤利吉總督要到其家拜訪，但因如前所述八月一日台灣全島下大雨，因此原本預定該日抵達，卻未果⁴⁸。八月四日安藤於八時四十分到達林家，閒談三、四十分鐘。中午林

蘇聯欲取勝亦殊不易，所可憂者內地之爆擊耳，現時難民千有餘萬，其將何以處置之也。」

⁴⁵ 《楊基振日記附書簡、詩文》上冊，1945年8月11日，頁178。

⁴⁶ 同上註，1945年8月12日，頁179。

⁴⁷ 《吳新榮日記全集》第8冊，1945年8月8日、10日，頁168-169。

⁴⁸ 〈灌園先生日記〉，1945年8月1-2日。他在7月22日已被告知8月2日總督將到霧峰。

家備三桌宴客，下午再陪總督到內新觀播稻，三時到台中州廳接受總督召見，四時開懇談茶話會，主要談四點：1、寒暄，並謝三月時曾向在座諸位徵詢過意見；2、日本內地雖遭轟炸，勿因此而生畏懼，需有必勝之信念；3、生產問題；4、義勇隊事受到在座的協助，講了四十五分鐘，一直到五時半閉會。

何以總督這時出現在台中？據林獻堂說總督視察南部，回到台中，恰在市區有敵機來襲，又沒到過霧峰，才會來此一遊⁴⁹；真相如何很難得到答案。八月十一日總督府鑛工局長、曾任台中州知事的森田俊介，也到林家閒談一小時，「而毫不談及戰局」，令林獻堂十分詫異。終戰前總督、鑛工局長都來到林家，到底有何意圖？以目前的資料，無法解釋這個問題。

早在本年六月十三日，台灣總督府即下令要組成義勇隊，而將皇民奉公會（於6月17日解除）傘下各種團體解散。亦即公布了義勇兵役法，凡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男子，十七歲以上四十歲以下的女子編成國民義勇戰鬥隊⁵⁰。在台灣的適齡男子都有參加義勇隊的義務，本文的記主也多少有些共同經驗。林獻堂早已得知要改組國民義勇隊⁵¹，而霧峰庄的國民義勇隊則在七月十日成立。

黃旺成在七月五日才載有義勇隊結成之事，而於八月五日參加在樹林頭舉行的義勇隊中隊結成式。吳新榮在佳里的義勇隊中被任命為報導班長，統管的是包括小隊長的十八名班員⁵²。吳鴻麒也參加義勇隊幹部會議，並提供他所種的花生⁵³。

由上，可知八月一日起，這些記主面臨全島大雨，防空壕進水，不能不汲水或另設新壕以為因應的局面；且食糧缺乏，又多人罹患疾病。對八月六日、九日原子彈攻擊廣島、長崎，八月八日的蘇聯對日宣戰有所了解。在日本最後十四天的統治中，人民的義務之一就是參加國民義勇隊，吳新榮還在提供換街庄長的人物簡介，林獻堂家更不斷有重要人士到訪，筆者猜測此行似與鼓舞戰時的士氣有關。

⁴⁹ 〈灌園先生日記〉，1945年8月5日。

⁵⁰ 岩波書店編集，《近代日本總合年表》（東京：該店，1968），頁342。

⁵¹ 同註49，1945年6月14日、17日。

⁵² 《吳新榮日記全集》第8冊，1945年8月8日，頁168。

⁵³ 〈吳鴻麒先生日記〉，1945年8月4-5日。

在島外的三位記主，對原子彈的爆擊一事較少記載，在中國北方的兩位記主楊基振與楊英風，則對八月八日蘇聯對日宣戰及其所導致的物價變動，有深刻的描述。

四、「戰敗」抑「戰勝」？八月十五日當天的記載

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對當時是日本籍的台人而言，到底是戰敗還是戰勝？當天的感受如何？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面向來觀察：

（一）展現復歸中華民國國民的感動：在北京二十歲的楊英風對日本投降，有著無比的激動，認為日本的投降是新時代序幕的開啟，聽到正午的廣播「我的心中充滿著停戰命令發佈時的喜悅，即刻恢復為中華民國國民的感動。拯救我等一家的感謝。我心情非常激動。啊！這不再是夢了。竟然這麼快！！！」「這時的喜悅，是筆墨、言詞所無法形容的」。他也惦記故鄉的親戚：「台灣的親戚們，大家都還健在吧！今天他們大概也很高興吧！日本佔領台灣五十年，宛如作夢般」。他的八月十五日充滿了興奮，他也開始同情戰敗的大和民族。

在天津的楊基振知道日本投降，他寫下以下的感慨：

回想盧溝橋那一聲槍響引爆的七七事變以來的九年，以及昭和 16 年 12 月 8 日日本對英、美宣戰以來的四年，真是全世界人類最悲慘的時期。特別是故鄉遭受五十年來的壓迫。年少以來的日本的仇恨心讓我寧願前往中國，今天還得以親眼見到日本投降的一天。如此一來，故鄉台灣事隔五十餘年後回歸中國，從悲慘的命運中解放，從此永遠接受祖國的擁抱。如作夢般，我流下欣喜的淚水。……日本自明治維新蓬勃發展以來，短短五十年陸續奪取朝鮮、台灣、滿洲、樺太等地，如今一切回歸原狀，這全是日本軍閥的錯。……

（二）戰爭結束的喜悅：經過四年的戰爭生活，物資缺乏，頻遭空襲的日子，終於在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後而劃下休止符。吳新榮在當天沒有特別記載其感觸，但八月十六日和三個朋友，「各脫衣裝，跳下溪中，洗落十年來的戰塵

及五十年來的苦汗。起了岸，各人向海面大聲絕叫：自今日起吾人要開新生命啦！」但心中也夾雜著些許不安⁵⁴。

遠在西貢的吳平城，他與病舍全員三百人一起聽「玉音放送」後，在場沒有人在這場合中痛哭流涕，使他覺得有些意料不到的平靜，他寫道：「我個人是掩不住滿心的歡喜，生命是真正的保全了，只要能早一天回台灣見家人，我什麼都不想，萬歲！」⁵⁵證諸他在一年前坐船離開台灣時寫道：「我心內向自己說，就是缺手斷腿，我也一定要回來，不可能為了這無意義的什麼聖戰犧牲，太不值得了！我發誓我一定要回來，否則，不但自己，連家人都未免太可憐了。」⁵⁶到日軍敗象已露的六月，他雖感佩於日軍有為國家盡忠、戰死沙場的心理準備，但他「還是決心要保全自己的生命，有朝一日回家鄉去見我的親人。」⁵⁷所以他在八月十五日對戰爭結束的欣喜，極為自然。

黃旺成八月十五日人在新埔，他平淡地記下：「正午ラヂオ特別重大放送，天皇煥發ボツタム宣言受諾詔書（御親放送）（為萬古開太平），聞勅之下多有流淚者。」他是晚和朋友喝金鷄酒慶賀，但「各謹慎不嘩」。

（三）對日本投降有相當的感慨：黃繼圖在中午聽到天皇的錄音廣播時，對日本的投降感到意外，他和桂芳兩人聽到瞠目結舌，全家自大人到小孩都鬧鬧。林獻堂在這天的日記寫著：「天皇十五日十二時親自放送，謂世界平和及日本民族發展之故，受諾ボツタン之宣言，爾臣民其克守朕意。嗚呼！五十年來以武力建致之江山，亦以武力失之也。」他和其弟階堂，兒子攀龍、雲龍、侄培英，共同談論此事，都沒想到日本投降這一天來得這麼快！隔天他精神興奮到過了一點多還睡不著，只好吃安眠藥，翌日仍不能眠，再吃藥。和他一樣睡不著的還有吳鴻麒，他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的日記載：「本日は日本接收波斯坦宣言之日，舊年之今日因感激至終夜不能寢。」

（四）對日本戰敗寄予同情：楊英風如上述，他對能恢復為中華民國國民有所感動，但對日本人也寄予同情，他首先說「我們從日本也得到很多的恩惠，

⁵⁴ 《吳新榮日記全集》第8冊，1945年8月16日，頁174。

⁵⁵ 《軍醫日記》，頁184。

⁵⁶ 同上註，頁52、89。

⁵⁷ 同註55，頁80、167。

但是，在大和民族的性格下，我等台灣民族也受到很多虐待」，他在日本教育下，到中國為止都對日本完全忠實地信賴，雖然也聽過台灣民族受虐之事，真正對日本感到不服是他到東京求學後，但他很清楚地分別他所憎惡的是日本政策、大和民族，但絕非憎恨所有的日本人，他崇拜的日本人也非少數。「一想到這次戰敗的大和民族，就覺得他們很可憐。越想越覺得可憐。」那天北京的天氣如颱風肆虐般，烏雲低垂，下著雨。「看着這場大風雨，心中充滿著理解大和民族的悲哀，我紅了眼眶。真令人無法忍受，……」然後他去拜訪他最喜歡的日本老師淺井武，但老師還沒回家，而這之前，其父母也去拜訪舊識的日本人石垣嬌嬌。

吳新榮在跳入溪中洗落戰塵與苦汗的第二天，單獨去見高柳氏，一話私情以及公事，「但未免感慨無量」⁵⁸。楊基振也在八月十五日晚上不停安慰濱田隊長，因為日本的戰敗。

八月十五日這天有欣喜於戰事結束，有感激於重歸中華民國，有的人覺得日本投降意外來得早，也有的人對大和民族的戰敗抱著同情；青年楊英風藉日記傾吐他對日本大和民族的愛憎，如實顯現台灣人的悲喜交集、但卻認知這將是台灣新生的開始。

五、戰後的最初十五天

戰後最重要的改變在文字的書寫上，如上所述楊基振、楊英風、吳新榮在八月十六日起開始用中文記日記，但畢竟依宣言要接收的中華民國政府遠在重慶，因此在日本投降到中華民國政府抵達這段時間，是否會有動亂發生，仍令人惴惴不安。上述八種日記在八月十六日以後的十五天中又透露出何種訊息。

（一）對治安維持的掛念：大凡朝代更替，最令人擔憂的是治安問題，特別是日本軍的動向如何也令人憂心。吳新榮去訪問高柳時，得知「台灣軍部，或出別行動，也未可知！」⁵⁹意味著台灣軍是否遵守天皇的命令投降，尚在未定之天！而陳忻及宮原武熊（眼科醫生）等人也促請林獻堂出面組織治安維持會，

⁵⁸ 《吳新榮日記全集》第8冊，1945年8月17日，頁175。

⁵⁹ 同上註。

但林獻堂認為此會不能只是民間人士參與，應該有日本當局參加方可⁶⁰。故在十八日先與族親、鄉親，一同擬訂治安維持會的綱領。八月十九日許丙、藍國城（藍家精）來請林獻堂到上海、南京去與即將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相關要人接洽，林認為此事必須慎重，許、藍兩人因此邀林先到台北了解安藤總督的意向。

八月十九日林獻堂到台北，見到台灣軍參謀長諫山春樹，商討明日同見安藤。翌日與許丙、藍家精、林猶龍一起會見安藤時，安藤表示他往後仍會對以下三項事努力：一是修繕因戰爭而破損的橋樑，二是救卹軍屬、戰死者的遺族，三是解除日軍的武裝，使對中國的接收，不發生遺憾的事。林獻堂也就治安是否需要台人協助、日台協力往後當如何，對於日華親善是否需要台人協助，這三個問題請教安藤。安藤回答會如前維持治安，但接收時也許會生些枝節，到時再請幫忙，後兩者則需幫忙。林、高、許之見安藤總督尚有一問題未請示，而由諫山加以回答，即林若欲往南京、上海，只能用個人的身份，而不能用總督特派的頭銜。

由此次的會面可知，戰爭中與日人親善之士要在第一時間搭上民國要人的橋，但又想借總督府的名義，以提高其身價，但看在已成戰敗國日方領袖的眼裡，相當難堪，然台灣人若能在日台融和、日華親善下，多幫點忙，亦無可如何。亦即此次士紳的探訪，得到肯定的答案是日本將維持治安到接收前，治安維持會暫時可以不組⁶¹。

（二）對未來局勢的不安：日本雖宣佈投降，但在台灣仍擁有相當的武力，治安雖一時不成問題，但中國政府短時間難以接手，台灣未來的命運會是如何？對日本戰敗而覺得台灣即將展開新生命的吳新榮，心中仍惴惴不安，十六日記載：「自今日雖說是和平之第一日，但難免一種的不安，無限的動搖。……此數日中要謹慎，而靜觀世界之大勢。」八月十七日雖然感受到平和之日已到，但他和朋友們都覺得：「總是時局未定，個個都感覺不安。」對於戰爭結束，已無空襲警報，卻還未解除燈火管制，夜間仍是黑暗，他認為「此如表現人心一種

⁶⁰ 〈灌園先生日記〉，1945年8月17日。是日林衡權受高等係之託來請林組織治安維持會。

⁶¹ 林獻堂在20日見總督，而22日另有中宮悟郎、牧沢義夫等人與許丙、林熊祥、辜振甫等人去見總督，表示台灣要獨立（或稱高度自治），總督不予贊成，而與事後爆發的所謂「台灣獨立事件」無關。這也是林獻堂、藍國城未被逮捕的原因。

的憂愁。」二十四日之前他曾聽到難以令他置信的事，就是說台灣將和日本一樣，會有盟軍的飛機飛來示威，幸好那天下午即解除警戒警報，且解除燈火管制，因此他相信盟機臨台之事必無，而台灣人已「無他意」（指對回歸中國沒有意見，似乎盟軍不必來示威了。）他在這半個月，除了到台南一帶看被炸的殘跡外，就是離開佳里到處去探聽消息，和朋友交換意見。他的朋友蘇新雖然已出發到台中，而在台中的楊達也早派人到台中聯絡⁶²，對戰後局勢有以因應，但他仍決定「於此空白時期，各人只要整理身邊的雜事。」⁶³

黃旺成在日本投降後對時局仍持續關心，記載安藤總督在十六日的廣播，也記載日本東久邇宮內閣成立，以及八月九日到十四日日本緊急的一個星期之動靜⁶⁴。對時局，他和朋友都覺得「以冷靜不輕言為戒。」⁶⁵十九日許丙、藍國城來找林獻堂的事，他也略有所聞：「台北辜、獻堂、熊次⁶⁶等與軍參謀等有計劃、肇加（嘉）、三連亦要歸參云。」但他仍認為「處世時須冷靜」。

（三）林獻堂對台灣未來的想法：當台灣的命運被決定後（儘管目前仍有不少人認為開羅、波茨坦宣言不具法律效力），台灣將何去何從，一定是當時有識之士的中心議題。在這八種日記中，唯有〈灌園先生日記〉記載了他對未來的看法。在日治時期他領導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主張設置議會、台灣高度自治，戰後他亦有如是的眼光，此外也受到藍家精的影響。藍家精，畢業於京都大學經濟科大學院，專攻殖民地政策⁶⁷，曾任汪精衛政權的僑務委員會委員、參贊武官公署之中將參贊武官⁶⁸，因長期在中國，據他的觀察，重慶遲早會和南京方面握手合作；而在台灣、上海的日本人可以如常在當地營生，更特別的是，他認為日軍在台可駐屯兩年，並擬用台灣人以圖日華提攜⁶⁹，這一看法部分影響了林獻堂。

⁶² 《吳新榮日記全集》第8冊，1945年8月20日，頁178。

⁶³ 同上註，1945年8月29日，頁183。

⁶⁴ 〈黃旺成先生日記〉，1945年8月16-17日。

⁶⁵ 同上註，1945年8月18日。

⁶⁶ 熊次即林熊祥，行次，因此改名為熊次。

⁶⁷ 興南新聞社，《台灣人士鑑》（台北：興南新聞社，昭和18年），頁433。

⁶⁸ 不著編人，《汪偽政權所屬各機關部隊學校團體重要人員名錄》（不著出版時、地、出版社），頁32。

⁶⁹ 笈干城夫，〈民國中將藍國城氏と語る〉，《土と人と砂糖の一生》（埼玉：せきたま出版社，平成元年），頁113-114。

林獻堂對台灣的未來、日台關係之理想是：「若能實現台灣亦為聯省之一，日台協力自治誠為萬幸。」⁷⁰據筆者的看法，林獻堂應已思考自己在中國政府治台後的命運，認為戰後中日關係唯有在親善、提攜的角度下，在日治時期的親日行為才不會被徹底追究，而尋求台灣高度自治的過程中也需要得到中國各省的協助，因而極力鼓吹日華親善、聯省自治⁷¹。他對這個看法相當堅持，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參加致敬團前往南京，之前應邀在台中演講時仍強調：「非聯省自治決不能救中國，亦不能救台灣。」但他的看法被中國國民黨省黨部委員李翼中潑了冷水⁷²，終究放棄。

除了林獻堂外，其他的人未曾在日記中留下他們對台灣未來的看法，只籠統的感知今後台灣換成中國人管了。

（四）對回歸中國的準備：台灣既然脫離日本的統治，那麼如何來了解中國，又有什麼具體的做法呢？而日治時期的左翼人士對國民黨的統治，又有何具體的行動？黃旺成有漢文底子，他對來訪的江尚文（江肖梅），勸其讀《三民主義》⁷³，他也教其子繼文早上讀《三字經》，傍晚學國語注音符號⁷⁴。無獨有偶，吳鴻麒在月底也開始「念官話的書」、及「註音字母」⁷⁵。由於他能官話，因此九月中旬就被役場請去教官話⁷⁶。就可見戰後初期學國語熱之一斑。

吳新榮常和朋友談時局，也注意時局的進展，在八月二十五日他就聽說陳儀要當省主席，副主席是謝春木，台南又要成為台灣的「主都」，軍司令是蔡某（又云李某）⁷⁷。八月二十五日的日記：「每致思於國事，難禁熱淚。」可見他想到了未來將會如何，而感嘆不已。八月最後一天，他聽說中國軍隊九月一日

⁷⁰ 〈灌園先生日記〉，1945年8月22日。林獻堂往訪台中州知事清水七郎，向他報告往見安藤的一些情形時，也說了他對台灣未來政治的期望。

⁷¹ 許雪姬，〈二二八事件中的林獻堂〉，收入《20世紀台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2年），頁999。

⁷² 同註70，1946年8月7日。

⁷³ 〈黃旺成先生日記〉，1946年8月24日。原文是「江尚文來，勸著三民主義」，著應為「讀」之誤。

⁷⁴ 〈黃旺成先生日記〉、〈黃繼圖先生日記〉，1945年8月28日。

⁷⁵ 〈吳鴻麒先生日記〉，1945年8月30-31日。

⁷⁶ 同上註，1945年9月16日。

⁷⁷ 《吳新榮日記全集》第8冊，1945年8月23日。蔡某有可能是蔡繼琨，李某有可能是李友邦。

要登陸台灣，立刻趕車回佳里，證實是流言。他思慕祖國之深，因此早早就加入了三民主義青年團⁷⁸。

左翼人士對時局是敏感的，日治時期的左翼人士在戰後即開始活動，八月十七日在台中的謝雪紅，就已開始了「人民協會」的組織工作⁷⁹，日治時期在農民組合中與親共人士不同道的楊貴（一名達）也開始活動，楊達想請林獻堂出面，謝雪紅不同意。但楊卻於二十日派人到台中來聯絡，內容不詳⁸⁰；二十三日與李喬松拜訪林獻堂，拿著「解放委員會」的宣傳單來。林獻堂在見過總督後，正在靜觀時局，見楊至，即勸他不要輕舉妄動，並訓他：「此時唯有靜觀，切不可受人嗾使，以擾亂社會秩序也。」

另一位原台共人物蘇新，八月十五日在佳里，二十日也出發到台中，由於他和謝雪紅不同道，可能只是去打聽消息，但吳新榮卻非常期待蘇新帶回來有用的消息⁸¹。

除了楊達、李喬松、蘇新外，往後涉入白色恐怖事件的李鹿⁸²、李義成⁸³也都紛紛出現在吳新榮的日記中。八月三十一日吳新榮還把李義成介紹給蘇新，說他們兩人都是熱情的分子。

（五）與日本人的關係：日本既戰敗，台灣因重歸中國而成為戰勝國國民，事實上日人還在台，尚未有勝利的實感，也未發生如吳新榮所說的：「總是過去三百年之一切，即清朝的遺風，日本的色彩，皆為此一戰完全清算去

⁷⁸ 鄭喜夫，《吳新榮先生年譜初稿》，收入台灣人物年譜叢刊第4種（台中：自刊本，1977年），頁52-55，1945年9月21日起。

⁷⁹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紀錄，《我的半生記》（台北：楊翠華自刊，1997年），頁309。

⁸⁰ 《吳新榮日記全集》第8冊，1945年8月20日，頁178。

⁸¹ 同上註，1945年8月20、22日，頁178、180。

⁸² 李鹿，1911~1996年，字石盤，台南學甲人，畢業於台北師範，早年加入農民組合，從事農民運動，1931年與謝彰洲在故鄉組織一班8人的「赤色救援隊」並捐款予之，為此被判刑，繫獄4年。228事件時曾參與由呂榮凱指揮的北門郡地下組織，因而逃亡，又涉入李媽兜案中，是台南市工委會學甲支部書記，後自首。晚年移居台東。吳新榮曾因勸李鹿逃走，而於1954年10月9日起繫獄4個月。見《吳新榮日記全集》第8冊，1945年8月29日，頁183，註3；歐素瑛，〈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以李媽兜案為例〉，《台灣史研究》15（2）（2008年6月），頁164，按李祿即李鹿。

⁸³ 李義成，台南永康人，州立台南第二中學畢業，後負笈中國，參加抗日，曾任台灣義勇隊指導員、新豐區區長，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因包庇李媽兜，而於1953年被判死刑。而李義成認識李媽兜是李鹿介紹的。見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3953號李義成，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42）安度字第0079號。

了。」面對此局勢，雙方如何建立新關係？再見日人朋友只有用「感慨無量」四個字來形容。吳新榮和兩位朋友拜訪舊識河崎夫人，夫人只能「感泣不止」。即使一起開談話會來論時局，彼此間也激盪不出火花⁸⁴。過去的親密感已經消失。

至於曾是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參與、貴族院議員的林獻堂，除了會見總督、知事等重要人物外，日本人在戰後更要攏絡他，似乎想利用林獻堂和南京方面接觸以了解國民政府對在台日人如何處置的問題，特別是安藤利吉是否可以留在台灣的問題。八月二十六日晚台灣總督府總務部致電林獻堂，說九月二日要開帝國議會的臨時會，而後又說延至九月四日（已延遲 2 日）⁸⁵，不料隔日又說沒有飛機，因而中止。林獻堂有自知之明，說道：「想是休戰條約於九月二日調印（簽字），而台灣已非日本領土矣！政府委員及貴族院議員同時消滅歟！」⁸⁶八月三十日牧澤義夫與猶龍來勸林獻堂到南京歡迎已被任命為台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林「義不容辭」就答應了，此時頗有拼命一行之慨，一為日人的命運探消息，兼為自己的未來打開困境，雖其妻怕他乘飛機有危險性，仍決定前往。此行因為見不到主角陳儀，並不成功⁸⁷，但他還是為日人帶回了有用的資訊，亦即安藤以歸東京較妥⁸⁸。

八月十六日楊基振所在的唐山戒嚴，啟新水泥廠停止對日本陸海軍供給水泥。先是唐山附近已有八路軍的行踪，因此為了維護廠區，仍要求日軍維持治安，之後又聽說八路軍包圍唐山，又不得不去請求高射砲隊長協助，到了八月二十二日，唐山西南已聞到砲聲，是治安軍與八路軍開火，又去請高射砲隊協助。在八路軍接近平津，且派人打探虛實時，日軍表示要保持中立，使唐山治安顯出悲觀，為了保護工廠，又想請先遣軍（國軍）來駐廠，但八路軍已進廠，這時又派人去請日軍協防⁸⁹，八月的日記中止於此，觀九月的日記，先遣軍先

⁸⁴ 《吳新榮日記全集》第 8 冊，1945 年 8 月 20、22、26 日，頁 177、178、180、182。

⁸⁵ 〈灌園先生日記〉，1945 年 8 月 28 日。

⁸⁶ 同上註，1945 年 8 月 29 日。

⁸⁷ 同註 85，1945 年 9 月 15 日。

⁸⁸ 許雪姬，〈二二八事件中的林獻堂〉，收入《20 世紀台灣歷史與人物》，頁 9-10。雖未見到陳儀，但見到其替身葛敬恩，也和久未謀面的同鄉見面。

⁸⁹ 《楊基振日記附書簡、詩文》上冊，1945 年 8 月 24 日，頁 183。

進入唐山⁹⁰。在日本已投降，國軍未見蹤跡之際，唐山的治安還要拜託日軍負起責任，令人感慨繫之。其實台灣也一樣，只是台灣尚無八路軍進入。

在北京的楊英風，則和弟弟英欽協助日本老師將書籍、書架、畫具搬入家中，到底是送給兩兄弟的還是寄放的，總之楊英風花了好幾天時間整理⁹¹，他們仍和日籍老師保持密切的來往。

在西貢的吳平城，面對的是已失帝國之姿的日本人同事，其司令部的軍醫長山本，還希望已成為中國人的吳平城，能和日本聯合起來打美國，甚至印了「國際俘虜公約」讓日軍閱看，以便向美軍爭取俘虜軍醫的身分。那時也傳來日本的南方軍自越南、馬來亞、蘇門答臘到婆羅乃仍然健在，要為建立第二日本帝國戰鬥到底⁹²。看來要在此亂世，如其所願保住一命回台看妻兒的希望，似乎還很遙遠。

（六）戰後十五天的生活：前面討論一些大問題，接著來看看戰爭後期和戰後初期這三十天前後，人民的生活有沒有變化。首先是人們開始由疏開地回家，吳鴻麒在三月底疏開到五股，他雖然要到十一月十六日才將家遷回台北⁹³，但八月二十一日就在真人廟召開「疎開協力會」的解散會。吳新榮八月十九日來到被轟炸後的台南市區，他和朋友「各祝疎開中的健康」，「而疎開者歸來之人已多」。

但是回到家後，電燈的供應是否恢復，吳新榮在八月十七日，記載戰爭結束，空襲也沒有了，但燈火管制仍未解除，所以夜間仍然黑暗，好像表現人心的一種憂愁，八月二十四日燈火管制終於解除，「忽然間街上大燈電燈，一時明朗的空氣大展。」在新竹的黃旺成也記載八月二十五日零時，解除燈火管制，「夜大光明」。林獻堂則記載說八月二十六日晚餐後失電，只好在黑暗中講話。

日治時期有收音機之家尚未普及，吳新榮有收音機，但在戰爭中，並非天天能聽，因此只要能聽就非常高興⁹⁴，當他在八月十五日想聽「玉音放送」時，卻因收音機沒電而沒聽到，故直到晚上才知道日本投降。黃旺成則告訴我們，

⁹⁰ 《楊基振日記附書簡、詩文》上冊，1945年8月25日，頁183；1945年9月10日，頁183。

⁹¹ 《楊英風全集》，第21卷：早年日記，1945年8月17日-23日，頁339-340。

⁹² 《軍醫日記》，頁184-187。

⁹³ 〈吳鴻麒先生日記〉，1946年1月1日。

⁹⁴ 《吳新榮日記全集》第8冊，1945年8月5日，頁168。

他在八月二十九日，由收音機聽到「放送掌中班」。他在日記留下的宗教活動，值得特別引用。

在本年中元節（8月22日）黃旺成家「奉祭祖先」，他的同居人一早肩挑來煨粽、米苔目、豚肉、兔肉、龍眼、魚蝦，使祭品更加豐盛，八月二十七日侄繼模由海外歸來，其弟媳劉氏好為慶祝其生還，白日為之「孝天公」，晚上又以「孝天公」祭品孝門口，而後招請黃旺成共食，食品不豐，除瘦鴨外均蔬菜。而農曆七月二十三日（8月30日）新埔普渡那天，黃旺成的同居人「買豚肉二斤，搓丸做紅龜」，再加上有人送的金鷄酒還剩半斤，還有些人送的剩龍眼，就成為祭神與祭自己五臟廟的佳食。

戰爭中物資缺乏，這是戰爭國家的共相，在戰後半個月內不可能有大改變，吳新榮怕政權交接之際反而物資短少，反而機警地開始買備柴糧，木麻黃（薪材）一千四百斤，蕃薯籤三百斤，花生一石，綠豆三斗⁹⁵。同一天林獻堂同意就地配粟，以免因為「收入農倉運搬之難」⁹⁶，吳鴻麒維持疎開協力會後的聚餐而大嘆浪費，但也談到菜色「極為豐富」，在台北市八月二十八日才恢復配米，十一點五公斤價格三圓九十五錢，一百斤龍眼才賣得一百四十圓，如果以此數據對照上述吃一餐三十多人吃掉一千圓⁹⁷，還真是浪費。

由上述可知戰後十五天，一般生活改變不大，除了不再有空襲，不必再躲防空壕，疎開者也得以歸家，物資亦未欠乏，只是士紳怕政權交接的空窗期治安起問題，想組治安維持會，在總督的保證下乃中止。而因與日人的關係由殖民者、被殖民者，轉化為戰敗者與戰勝者，且日軍（加上日人）尚有數十萬在台，一般人民處在不安之中，此時雖有「台灣獨立事件」的發生，但大半台人都欣喜於脫離日本的桎梏，亦沒人反對來自中國的統治，一般都是靜觀以待。而後開始學官話、教注音，讀中國書，有人打聽中國何時來接收。而在台日人忐忑不安，很想了解是否能繼續留台，台灣人（尤其是與日人協力的士紳）面對不可知的未來，亦想及早接觸南京方面的要人，特別是已被任命為行政長官的陳儀，這也就是林獻堂為自己往後命運及日軍未來，而往南京、上海的原因。

⁹⁵ 《吳新榮日記全集》第8冊，1945年8月17日，頁175。

⁹⁶ 〈灌園先生日記〉，1945年8月17日。

⁹⁷ 〈吳鴻麒先生日記〉，1945年8月21日、28日、30日。

六、結論

本文利用八種日記來看日本投降的八月十五日當天，以及八月十五日前後台灣社會所面臨的狀況，為戰後到中國政府接收間台灣社會動態做一補白。當然能寫日記者都是當時知識分子，也許未能盡知一般小民的全面性看法，但這些人多半是社會領導階層或士紳，多少能代表一些人發言是無可置疑的。這八種日記分別由黃旺成、黃繼圖父子、林獻堂、吳新榮、吳鴻麒，以及在海外的楊基振、楊英風與吳平城所寫，其中有四種未經出版，最早出版的是吳平城的《軍醫日記》，至於吳新榮、楊基振、楊英風則是這一兩年出版的。

在戰爭最後的十四天，空襲仍不斷，再加上八月一日及以後陸續的下雨，連賴以躲避保命的防空壕都進水，不得不舀水或蓋新的防空壕。在生活方面疎開生活帶來的不便，物資較為缺乏，再面臨八月六日、九日美國對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九日零時蘇聯，開始越境，四路進攻「滿洲國」，這些變化，台灣人都知道日本投降已是必經之路，只是驚訝於來得太快！

八月十五、十六這一、二天，日記中記載他們對日本戰敗的感懷，除了吳鴻麒日記缺外，楊基振、楊英風都直截了當地顯示自己將成中華民國國民的喜悅，但也不免回顧日本的治台，甚至同情已成戰敗者的日人。林獻堂譴責了日人的窮兵黷武；吳新榮痛快地與朋友跳入河中，似乎要洗淨受日本統治的塵埃；吳平城則欣喜於戰爭結束，只想早一天回台看望家人；黃旺成老神在在鎮靜處之；林獻堂、黃繼圖都感慨於這一天這麼快就到來！無論其心情如何，最確實的感受是戰爭結束的喜悅。

成為戰勝國中國統治下的台灣人，面對日軍武力仍在，日人尚在，即使「戰勝」，亦未有如中國般的慶祝，反而心中惴惴不安，亦即在此空窗期中、日兩國會採取什麼行動，台灣人一無所知，一如他在五十年前被割讓一般，為此台灣人的有識之士想組治安維持會，想打聽南京政府（時在重慶）的意向，最初的接觸終由林獻堂來進行。他訪問安藤，了解總督有意繼續維持政局安定、產業復甦以及修繕被破壞的公共設施，安藤也不贊成參謀與台灣士紳合謀的獨立作為，台灣的局面終於穩定下來。

這時人們的生活和戰前最大的差別在於不再有空襲，可以自疎開處回到家園，防空壕的功能也喪失，到八月下旬終於所有警報、電燈管制都取消，米也開始配給，終於稍稍恢復常態。在農曆七月七日、七月十五日恢復了祭神。但是仍有人開始積柴糧以備過渡時期之用。由於確立中國將來接收，因此台人紛紛打聽彼岸的消息。能官話（北京話）的開始復習，甚至開始當起官話老師，也開始教家人、朋友注音符號，不過由日記中已可看出中共的積極性，天津、唐山一帶已可見八路軍的影子，後來先遣軍（國軍）的進駐暫時穩定了局面。在台灣則原台共分子、左翼人士，莫不蠢蠢欲動，如楊貴、李喬松、蘇新，在吳新榮日記已看到李鹿、李義成的影子。可見左翼分子對奉行資本主義的國民黨早已準備做進一步的鬥爭。林獻堂等人聯省自治、日台協力、日華親善的理想，似乎沒有達成的跡象。

經由以上的研究可知，八月這個月在物質生活上的變動不大，但在心理上則起起伏伏，當時台灣人夾在中、日兩國之間，他們如何看這場戰爭，台灣人到底是戰勝還是戰敗？日記中給了部分答案，如果記主認同回歸中國，無疑地是認為戰勝。戰後的這半個月雖然較平穩的過去，但之後社會秩序日趨紊亂，尤其是為了報復日治時期作威作福的日本官員，台灣警、吏，屢有事件發生⁹⁸。既有報復行動，維持治安的警員紛紛逃離，警力不足，恐嚇、竊案頻傳，使得民間不得不自行維持治安，以每日工資二十元請人組成自衛隊，甚至還得向當局請求給槍，才能遏止亂象，連林獻堂住居地的霧峰尚且如此⁹⁹，亦可推之他處。而這時已是國民政府接收後，再加上米價上漲，連帶的物價上漲，部分官員的接收貪污不法，再加上以漢奸嫌疑逮捕台灣士紳所引起的社會不安¹⁰⁰，在在都將台灣社會推向爆發的頂端，二二八事件的遠因雖尚未見於八月十五日到三十一日，但這七位記主（其中楊英風於1947年回台）往後斑斑地記載當時社會的變化，政府的失敗，人民的困苦，台人遭受的差別待

⁹⁸ 增田弘夫，〈台灣的戰中戰後の物語〉草稿本，許世楷駐日代表於2008年6月轉送台史所，謹誌謝意。其中「終戦と暴動」、「父の拳銃」有相關記載，頁134-136。增田弘夫為灣生（台灣生日本人），成長地是屏東。

⁹⁹ 許雪姬，〈二二八事件中的林獻堂〉，收入《20世紀台灣歷史與人物》，頁1007-1008。

¹⁰⁰ 同上註，頁994-995。

遇，無一不是研究二二八事件及往後台灣史最重要的素材！可嘆的是吳鴻麒死於二二八，黃旺成因在《民報》批評時政，不得不在事變後亡命一年於中國，黃繼圖也在二二八事件後被控「參加處委會實行叛亂」¹⁰¹，亦即事件中擔任部長；吳新榮在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二次入獄¹⁰²，林獻堂也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後赴日，不再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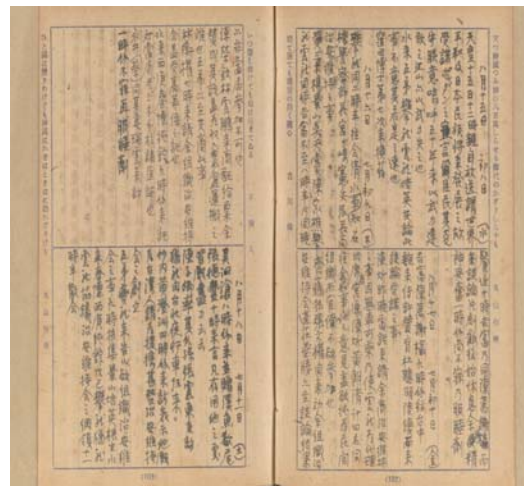
日記的素材在未來台灣史研究上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願本文的出現，而有了拋磚引玉的效果，更盼更多人提供日記以豐富台灣史的研究資料。

¹⁰¹ 〈二、二八事變叛逆名冊〉，拂塵專案附件第6卷340.2，55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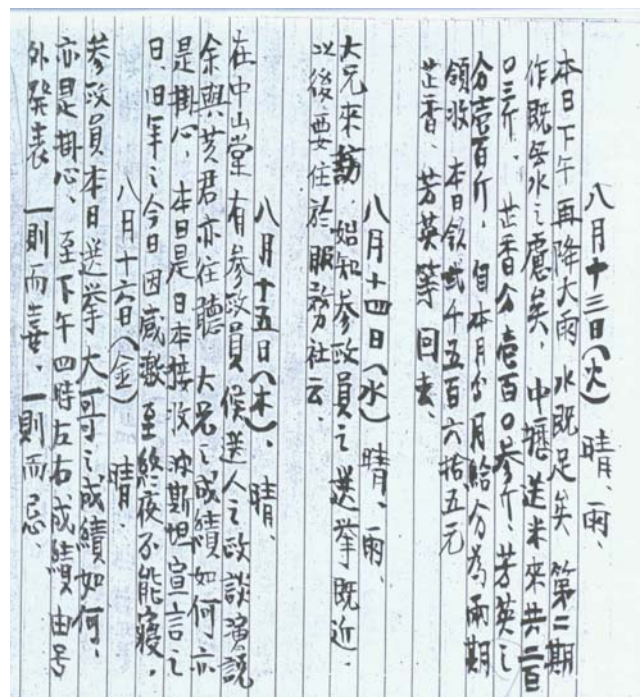
¹⁰² 吳新榮自1947年自3月14日到4月25日離家走避，5月26日向台南市警察局辦理自新手續，到6月21日獲釋。到1945年10月9日因李鹿案被牽連，自是入獄4個月又2天，直到1955年4月14日獲釋。鄭喜夫，《吳新榮先生年譜初稿》，頁62-63、87-88。



圖一 1945年8月15日
〈黃旺成先生日記〉



圖二 1945年8月15日
〈灌園先生日記〉



圖三 1946年8月15日
〈吳鴻麒先生日記〉